

韓國自 1990 年代以來的東南亞研究:多方面的回顧及反思

OH Myung Seok; KIM Hyung-Jun; CHOI Horim; CHO Hung-Guk;
CHOI Byung Wook; KIM Young Aih; PARK Sa-Myung; JEONG Yeonsik;
PARK Eunhong; BAE Geung-Chan; PARK Bun-Soon; JEON Je Seong

序言

本文旨在就“韓國自1990年代以來東南亞研究:多項做法的回顧及反思”所提出的意見做成摘要,並在2007年10月27日所召開二年一度的韓國東南亞研究學(KASEAS, Han Kuk Dong Nam Ah Hak Ho)會議中提出供特別集體討論。十一位學者藉此難得機會就單一議題從上午十點到下午三點討論近四小時,尚不包括午餐時間。促成此一籌劃完善盛會的一項主因在慶祝東南亞研究(Dong Nam 亞洲 Yeon Gu)出刊十五週年。東南亞研究於1992年10月創刊後隨即在韓國引發一波東南亞研究風潮。之後,韓國的研究環境雖不盡理想,韓國的東南亞研究在質與量上均出現大幅成長。董事長與董事會其他成員均認為最佳的慶祝方式就是舉辦會議,俾透過對以往的學術工作進行回顧及反思以確定今後各項研究工作的方向。與會者均同意以摘要文件格式將討論內容做成記錄。

參與集體討論者均須提出一份十五分鐘長的摘要報告。所有報告均經錄音錄影後再製成謄本。按照我們規定做成的書面報告又經複製,並由各報告人自行根據報告謄本及討論內容將過長或過短的報告重新加以編排。身為KASEAS(韓國東南亞研究學會 Korean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所長的JEON Je Seong博士即將每一份討論報告摘要又加上序言後再將整個報告重新加以編排。完稿又經全體參與集體討論者以及KASEAS主席OH Myung Seok博士與擔任東南亞研究編輯的PARK Seung Woo博士二人審查後通過。

我們極盼此一包含多項相關意見的本文,在經過大家的努力後,不僅對韓國的東南亞研究工作,更對一般該區域的研究工作均能產生回顧及反思的作用。我們更應感謝所有參與討論者對我們的全心支持以及對此一理念所投注的心力。

II. 韓國人類學家的東南亞研究

前言

OH Myung Seok (首爾國立大學): 我在此提出一份由韓國人類學家所完成1990年代以來韓國東南亞研究工作的總覽。我在此擬討論二方面。第一,完成東南亞研究工作的韓國人類學家有那些人? 第二,其等研究工作主題及觀點又有何主要特性?

如果我認定韓國人類學家係在90年代以後才開始進行東南亞研究工作亦無誤。90年代以前的確有過一些相關研究工作。但當時未成氣候且範圍亦僅限於在韓國由人類學家所進行的東南亞研究。直到1980年代,韓國的人類學家仍認為在韓國進行其等的研究工作係當時最自然的決定。1980年代之前有些學者對韓國以外地區做研究,但當時韓國人類學家的主流想法仍認為他們應該研究韓國。唯後來研究重心由韓國文化大幅轉向至外國文化。韓國人類學家對東南亞的興趣因而大幅提升。

韓國一百位有博士學位的人類學家中有五十九位，也就是近六成是以外國文化做為其博士學位論文的。此一現象或許顯得博士學位得來輕而易舉，但實際上則突顯出韓國人類學界的怪異處。在歐美國家研究外國文化非屬少見，日本亦然。唯多數第三世界人類學家僅研究其本國文化；研究外國文化者屬少數。在此方面，事實上韓國人類學家多數研究外國文化乃一獨特現象。我們如再將1990年代以後取得學位者進行分析，即可看出研究外國文化的人遠超過研究韓國文化者。目前，研究外國文化顯係韓國人類學界的普遍現象。

研究日本的學者有十四位，十一位研究東南亞，十位研究中國，另有九位研究美國。研究美國的學者中有半數專門研究在美國的韓國移民。此外，另有幾位研究印度，非洲，拉丁美洲與歐洲。專門研究東南亞並提出博士學位論文的學者佔研究外國文化學者人數的兩成，係人數第二多的組群，僅次於研究日本文化的學者人數。但緊迫在後的是研究中國並提出博士學位論文的學者，因為此一組群的人數正快速成長中。十一位研究東南亞的學者中，有六位於2000年代取得博士學位。此係最新現象，而且另有數位正準備提出其東南亞研究論文，所以人數亦在增加中。再分析這十一位取得博士學位學者的研究國家，結果十分有趣，程度亦有極大不同。其中有四位是在韓國取得學位，二位在美國，二位在澳洲，一位在英國，另有二位在東南亞國家取得學位。其中僅有二位學者在美國取得學位事屬例外，因為多數研究外國(非東南亞)文化的學者均係在美國做研究並取得學位。唯經分析目前在海外求學韓國博士生的趨勢後發現，未來會有更多在美國完成學業的學者出現。至於博士論文的研究區域，印尼居首位(有四位學者，分別是Kang Yoonhee, KIM Ye-Kyoun, KIM Hyung-Jun與CHO Youn-Mee)，且係平均分散在其他東南亞國家中：其中包括越南(CHAE Suhong, CHOI Horim)，馬來西亞(OH Myung Seok, HONG Seok-Joon)，泰國(KIM Yi Seon, LEE Sang-kook)以及菲律賓(KIM Min Jung)等。迄今尚無人就寮國，柬埔寨及緬甸三國提出博士學位論文。研究印尼的人數極多，唯對東南亞國家所做研究仍缺乏深度。

這十一位學者已形成一高同質性組群。其中多數係首爾國立大學人類學系的畢業生，且至少均已獲有學士或更高學位。另外，其中多數亦係所謂的‘386世代’，且係在1980年代初期就讀大學並胸懷同世代精神。由於其特性之故，此組群各成員間關係十分密切。唯，亦正因此，此組群各成員的理念極為類似，甚至有時會在學術上出現‘近親繁殖’的問題；因為他們相互間十分瞭解，所以會避免對其他成員作品做出嚴厲的批評，否則就屬不當。

接下來，我要就本項研究結果稍加討論。我將根據這十一位學者已上傳至韓國研究基金會網站的公開資料做討論。刊載在各學術性期刊或書籍上的研究報告共計有九十九篇。其中有六十五篇係針對印尼及馬來西亞所做，比例高達六成五。其中一項原因是身為馬來西亞專家的HONG Seok-Joon以及身為印尼專家的KIM Hyung-Jun二人均係多產學者。他們二人共刊出四十份研究報告。另一顯著現象為許多學者均就其等博士學位論文主題所述各個國家提出後續研究報告。此亦顯示人類學家們均極力維護各自的專業領域。針對整個東南亞區域所提研究報告僅有五份。此類研究報告僅屬概論性，且數量有限。討論韓國與東南亞間關係的研究報告亦僅有五篇。整體而言，上述各點均顯示韓國的人類學家均在強化各自的專業並提出後續研究。

至於研究主題方面，宗教及習俗佔大多數，計有二十八篇專門討論印尼與馬來西亞的宗教及習俗。相對地，並無任何研究報告係針對東南亞主要宗教之一的佛教。另有多篇研究報告係針對各國及其種族所做。較須注意的現象為人類學家們多專注於文化的政

治面。十一篇研究報告多針對民運或當地政治，另有其他研究報告係針對回教的政治面，一如對各國及其種族所提報告。其原因或係人類學家們長期與韓國東南亞研究協會的政治學者合作後受其等影響所致。令人意外的是，針對血統關係，家庭以及婚姻等傳統人類學研究主題所提研究報告反而不多。此一現象在KIM Min Jung就菲律賓人血統關係所提研究報告中尤其明顯。雖有數篇研究報告的主題係就跨國婚姻，外國勞工或文化交流等與全球化相關議題所提，仍欠缺與此等主題有關的研究。儘管韓國及東南亞國家間互動頻繁，韓國的人類學家們仍未對該區域表現出興趣。

另，已刊出的研究報告種類亦極有趣。學者們多刊載於與其等研究報告主題內容極為相關的刊物上。其中有四分之一係刊載於韓國文化人類學或跨文化研究，二者均係韓國在人類學方面的主要期刊。不少人類學家把其他人類學家當成閱聽對象。其次為東南亞評論。區域性研究期刊則包括有國際區域研究評論及東亞研究。我們認為人類學或區域性研究的學術性期刊則係主要的刊登管道。

現在再看狀況分析。至於方法論，人類學方面的研究多須進行長期實地研究工作。上述所有十一博士學位論文均係依據長期實地研究完成。至於研究主題，十一件研究中有九件係針對鄉村地區，只有一件係針對城市(CHOI Horim)，另有一件係針對工廠進行的(CHAE Suhong)。我們因此瞭解這些研究工作多以傳統方式選擇其主題，例如多針對一個社群。至於緊接著其等博士學位論文的後續研究方面，則多選擇新研究主題。其等就研究主題多針對社團，組織或城市進行短期實地研究。此舉原因是提出博士學位論文後再進行長期實地研究有實際上的困難。如無法避免此現象時，我們即須討論如何以適當方法進行實地研究。

至於研究角度，我認為許多人的觀點及評鑑時的想法均相同。可以確定的一點是我們反對傳統文化觀。文化在傳統人類學中的解釋是一種獨特的生活方式制度或一個特定國家一貫獨有卻又難以改變的想法。我們大家均瞭解文化是難以整合但卻又包含多項零碎且相互對立的元素，既無法加以規範但又可以隨不同社會狀況及內容加以改造：因此我們應特別注意其變化過程。此一觀點係1980年代後的人類學的普遍現象。我們認為研究東南亞的人類學家均有此現象。

我另同意東南亞研究方面的此一批判性心態以及許多研究結果實際均係依據此一作法而來。另一方面，我亦認為我們正論及此點且已得出相同結論。硬說文化是零碎且相互對立或文化隨時在變就難免是陳腔濫調，或者我們應該說明與立場性狀況相關的文化？我們是否能夠僅以此方式討論新事物且此種說明方式又是否已顯過時？因此大家不應持續累積實驗證據而應訂定日程以進行理論性討論。我亦認為包括我自己在內的人類學家都只會批評別人。我們不常提及他人且亦不常批評他人。我認為我們成員間仍缺乏學術性討論及辯論。

最後，我認為東南亞人類學研究工作普遍欠缺比較文化性研究。僅有少數研究工作將其自身的區域與其他區域或東南亞區內其他不同文化做比較。多數研究工作僅針對其自身的區域且未嘗試將其與其他地區做比較。我曾認為此係無法避免的現象，但現在瞭解此現象可能是問題。由於在方法論中強調實地研究，我們認為不應涉及我們尚未進行實地研究的地區。此一想法因此阻止我們進行比較性研究。人類學家對多方論述通常採取批判的態度。諸如現代化，全球化及資本化等多方論述實係一種將不同社會做比較的現象，只是人類學家常對此類多方論述是否適當進行批判。我們對特定社會中的普遍文化性現象更加有興趣。因此，我們強調並實際研究特定區域的特性。但

我仍認定此類研究僅有助於批判多方論述的限度以及是否適當,即使其他學術研究領域均瞭解特定方式中總免不了出現普遍的現象。因此,僅只點出特殊及奇特處仍嫌不夠。我們應該進行更多比較性研究以找出特定區域中看來奇特但實際已普遍存在於多種文化中的文化性現象。一種突顯東南亞文化的特性在於其多元並且具備極佳且豐富的條件供進行比較性研究。只是我們非但尚未將之善加利用,反而讓自己深陷自己的研究範圍內。

我因此想到將此結論運用到反思其他地區研究的結果上。研究美拉尼西亞或波里尼西亞的二地人類學家已透過積極比較並檢視其他研究區內多個社群者工作的方式而開發出互換禮物或戲法的理論以建立互換禮物或魔術的一般理論性原則或變項。對此,我們應積極地完成東南亞多元文化的比較性研究工作以建立有意義的文化性理論。

宗教及族群研究

KIM Hyung-Jun (江原國立大學): OH教授與我們進行長時間討論,事實上我的論述中多少亦與其意見重疊。我強調的是人類學對宗教及族群方面的研究目的是指引方向。十位人類學家中有八位已研究過宗教及族群問題。其中又有三位的博士論文題目就是宗教。他們分別是**HONG Seok-Joon**, **CHOI Horim**及我。完成博士論文後他們亦持續進行宗教研究工作,且表現突出。換言之,其中任何一位的博士論文都會影響到另一位的博士論文。

KIM Min Jung及**KANG Yoonhee**二位即特別以新加坡的宗教為其博士論文題目。這二位以及前三位間的共通點在於對當地習俗的重視。一般來說,此一狀況說明致力研究習俗的人類學家與韓國的人類學家為何會注意習俗而研究習俗又分成幾個方向。其中一個要點是強調習俗中的文化或形勢上的意義而非所有習俗所重視的歷史性或不變的意義。也就是說,是在嘗試找出習俗中的文化意義以形成主流。此類研究的優點在於檢視不同地方習俗及文化中的多重意義以及多層次特性,同時仍須面對多項問題。也就是說,在強調形勢上的意義之際,卻忽略累計習俗中最基本資料的重要性。例如,有多項研究係在查知不同背景的人如何解釋並經特定習俗付諸行動。只是少有研究係針對東南亞人民一面遵行舊習俗的同時亦在成長的事實以及這些習俗中的最基本特性。由於此一研究趨勢,現今的人類學研究均無法引起一開始即對有意研究東南亞地區宗教或習俗的人類學學生的興趣。因此,能利用的相關研究多數僅屬極少數專家所提出。我即常遇此問題。我認為很難要求自己的學生閱讀我的研究結果,因為其中多述及非特定現象,一般學生難有興趣。

相對於宗教研究,族群研究工作方面所進行的討論就普遍許多。原因可能是根本沒有學者提出以族群為題的博士論文。結果,多數族群研究的資料均屬舊有或輔助性。**OH Myung Seok**及**CHO Youn-Mee**等提出個案研究的二位學者則係使用短期實地研究中所蒐集的面談資料。有鑒於此,我們可能會考慮人類學家所面對的抉擇。亦即,使用學者樂於使用且一般讀者無法閱讀的資料。唯如欲向更多人公開時,人類學家通常會使用自己不完全滿意的資料。

韓國的人類學家對東南亞地區宗教及族群研究工作有數項趨勢。第一,其等的博士論文題目多受上述三位學者的研究方向的嚴重影響。此點從諸多學者以宗教為其博士論文題目因而出現大量宗教研究的事實即可看出。

第二, 宗教研究有朝專家水準發展的趨勢。只是, 整個東南亞地區宗教或個別國家宗教狀況的研究工作則遭忽視。此似乎又與韓國學院派國際研究的發展途徑有關。1980年代後期在東南亞初次被選定為研究題目時, 韓國國內的國際研究工作尚在啟蒙階段, 而且那極少的東南亞宗教研究亦係經參考相關書面資料或根據主要研究工作所完成的。1990年代中後期, 學界在國際研究方面出現了結構性變化; 之後學術性活動即開始增加。在此狀況性變化期間, 學者紛紛就宗教提出專業研究報告。相對於此一量增情勢, 概要性宗教研究工作未受重視。此舉結果產生積極變化, 亦即, 出現極多的專業性研究。但此類研究在東南亞宗教概略介紹或說明方面對相關學習者所提供的有用資料卻極少。在此方面, 過度專業性的研究似乎反而難引起一般人的興趣。

第三, 族群研究工作似乎不如宗教研究積極。但相對地, 族群研究方面的概略介紹或說明卻不乏。有鑒於此, 族群研究工作可能須添加更多深度研究資料。屆時才會出現更平衡的研究工作。

全球化

CHOI Horim (韓國東南亞研究): 我所準備的是韓國人類學家東南亞研究中對全球化的研究。全球化一詞係指資本市場經濟在全球擴張或越界變動以及人與人, 貨物與貨物甚至於資本與資本之間互換所引發的人們有多重國籍以及日常生活中出現多種文化經驗的現象。人類學方面與此相關的研究主題包括有因隨著而出現的觀光, 外籍勞工, 外國人直接投資, 跨國婚姻, 文化交流, 散居者, 多文化社會, 文化混種, 加強人種(國家)認同等或因抗拒全球化而產生的傳統創新, 地區化與全球化等的現象。

由於目前全球化現象在東南亞國家已極明顯, 因此, 研究此議題就漸趨重要。我首次提出的此項研究係依據由東南亞地區所蒐集資料針對人類學在全球化議題上進行研究。後來此類研究出乎我預料, 因為少見。因此我將初期目標轉為批判類似的研究工作—因為已超出學術混種的範圍—所以無法進行。以後我將探討此類研究的意義而非僅將其等在概念上進行分類及討論其中的問題, OH Myung Seok及KIM Hyung-Jun兩位迄今即係如此進行其等工作。我的研究或許有見樹不見林的缺點。但仍對此等研究工作進行審視, 或可容各位一窺樹林之貌。欲知詳情, 請參閱我的研究報告。

第一, 我要就人類學家對全球化的研究報告提出綜覽。2007年九月前已獲得博士學位的十一位人類學家中有七位專門研究全球化下東南亞社會或人群問題。他們的研究主題包括有跨國婚姻 (KIM Min Jung與KIM Yi Seon), 外籍勞工及投資(CHAE Suhong), 觀光 (KIM Yi Seon, OH Myung Seok與 HONG Seok-Joon), 傳統的持續性, 改變及重新調適 (KIM Ye-Kyoun, KIM Yi Seon, CHOI Horim與 HONG Seok-Joon)以及文化對全球性經濟危機的反應(OH Myung Seok與 HONG Seok-Joon)與多文化社會(HONG Seok-Joon與 KIM Min Jung)。唯, 其中並無任何研究係以‘全球化’一詞做為主題, 而且也沒有任何人類學家專門就全球化下的東南亞進行研究。

針對該地區所完成的研究報告計有十份。OH Myung Seok對馬來西亞華人社會(1999年)以及馬來西亞回教徒對經濟危機反應(2001年)所做的研究報告, CHAE Suhong針對由海外返國的越南勞工 (2007年), 胡志明市一家多國投資工廠(2003年), 越南的韓國人社會 (2005年)以及HONG Seok-Joon就馬來西亞觀光客事件(1998年), 馬來西亞經濟危機(1999年), 外國文化的適應及馬六甲的多元文化 社會(2004年; 2006年)。KIM Ye-Kyoun針對印尼蘇拉威西島文化重新調適(2006年)以及CHOI Horim就後社會主義

化越南傳統的持續及改變(2005年, 2007年)所完成研究報告中均部份涉及國家主義者或地方主義者對全球化或混雜現象的反應, 唯其等焦點仍僅集中在全球化上。KIM Yi Seon的博士論文(2004年)及後續研究(2004年)雖與觀光有關, 但仍僅係針對傳統工藝商品化在意義上的改變。

韓國人類學界在對東南亞人或各種社會方面的研究成果亦極突出。部份範例甚至於討論到在韓國的東南亞移民及東南亞的觀光業。OH Myung Seok就赴東南亞的韓國觀光客眼中的東南亞所做研究(2006年)即為一例。該項研究係針對韓國人如何形容(觀光)而非分析東南亞觀光業的現況及歷程。因此, 充其量僅代表韓國人的態度與看法。在跨國婚姻及外籍勞工方面, KIM Min Jung則就娶韓國女子為妻的菲律賓人, 越南人與菲律賓人所面對的抉擇(2003年)以及跨國婚姻, 移民等議題完成數像研究, 主要均係針對‘移民女性化’(KIM Min Jung 2006年)及‘跨國婚姻中女性移民在文化衝突方面的經驗以及改善溝通方式的相關政策’此一由韓國婦女發展協會所發啟的計劃(KIM YISeon 2006年)。上述研究報告均顯示社會極須就因工作或婚姻之故由東南亞移居韓國人口不斷增加所造成的有關文化衝突及社會問題上尋求學術及政策上的解決辦法。即使‘多元文化社會’現象已在韓國漫延, 但參與此類研究的韓國東南亞研究人類學者仍屬少數。至於KIM Yi Seon所完成的政策研究計劃, 我亦曾參與多對由越南人與韓國人所組成跨國婚姻夫妻的面談工作。我的經驗是進行涉及東南亞人士跨國婚姻深度面談時應同時能使用當地語文並瞭解當地文化。深入瞭解東南亞各國文化固然重要, 我仍認為另有需要研究目前及未來韓國人社會。

我選擇審視‘韓國風潮’係因此一議題極度適合研究東南亞全球化的韓國學者。一如前述, 韓國風潮已成為一流行性的研究議題, 而且其中涉及諸多方面, 其中包括政治學, 經濟學, 媒體研究, 文化研究, 文化以及藝術評論。其中許多由政治學者, 經濟學者或語文學者所完成的研究已紛紛出版。由人類學家就特定國家內韓國風潮所完成的範例式成果屬一位人類學家就特中國韓國風潮所提出的研究(JANG Soo Hyun 2004年)。另有許可非人類學家就其他方面所做研究, 凡此均顯示我們有需要另開立出版品清單。有趣的是沒有進行東南亞研究的韓國人類學家就東南亞的韓國風潮提出任何論述。此又涉及我等對韓國風潮及全球化議題上的人類學地位。

有關此點, 政治學者SHIN Yoon Hwan在其“東亞的韓國文化風潮: 比較性分析”(2002年)一文中提出重要論點。我們或應注意韓國學院派對東亞各國, 其中包括中國, 台灣, 越南, 新加坡及蒙古, 一窩風出現的韓國風潮的類型式觀點。SHIN表示, 各國間對韓國風潮的看法多有不同且落差極大, 從極度肯定到極度否定, 甚至於表現出輕蔑態度的都有。其中, 文化人類學家們及文化評論家們常用在批評韓國風潮時的一些輕蔑性關鍵字包括“廉價”, “零售”, “膚淺的次級”, “低俗”及“人慾”等。換言之, 文化人類學家們已對韓國風潮表現出極強烈藐視的態度。

我瞭解上述似是而非的論點實際上是一種要求各個東南亞國家在深陷韓國風潮及吸收外國文化及文化性產品之際應多就質方面進行研究的呼籲。此舉使我們需要多進行論證式研究以瞭解人類學家是如何看待東南亞國家的韓國風潮。目前人類學家們已就韓國風潮完成多項研究工作(例如, KIM Hyun Mee 2002年; CHO-HAN Hae Jung 2002年), 而此等研究工作又可被歸類為對‘韓國風潮所完成的研究,’ 不僅強調出韓國風潮創始國(韓國)或接受國(東南亞國家)的反應, 或以批判態度對與該一現象相關的論述做出評價。人類學家仍對‘韓國風潮’保持懷疑態度, 將其視為一個可加以辯論的概念。特別是, 有些觀點 – 諸如基於其可增加國家利益, 強化國家形象與地位以及增加國

家利益外加強調韓國與東南亞親和力的效果等理由進行崇拜 – 均與人類學論點不符。又, 此等觀點中所包含的文化概念又與人類學家們一向所強調的文化觀相背。

研究東南亞的人類學工作多針對越南, 泰國, 菲律賓及緬甸等韓國風潮現象並不顯著的‘傳統性’研究的領域。亦即, 人類學家多半注意文化認同中的特定事件, 社會性及經濟社會性變化過程中出現的衝突以及全球化過程中傳統文化的補強與改變。對於熟悉當地文化的人類學家而言, 韓國流行文化蜂擁到東南亞各國的現象僅係特定東南亞國家的本國文化與外國文化間較大規模完整互動過程的一部份。儘管如此, 我仍認為大家應對韓國風潮進行更多人類學方面的研究。對現下韓國風潮在東南亞國家出現的普遍性及特別性所進行的定質性研究看似極適合人類學家對韓國風潮加以探討。

最後, 我在此提出幾點結論。第一, 即使對東南亞進行的人類學研究數量已快速增加, 加上我們現在面對許多高價值研究報告, 卻仍欠缺對全球化的研究。我已詳閱過一些有關外籍勞工移民, 跨國婚姻, 觀光的研究 – 且全部均將全球化列為關鍵字 – 只是這些研究大半係由韓國人而非東南亞人完成的。例如, 研究東南亞因跨國婚姻而移民的報告中獨缺對東南亞人社會文化背景方面的報告。對東南亞因跨國婚姻而移民人類學研究中, 對東南亞的研究顯然有充分的依據, 我們不僅須吸取這些定居韓國家庭的多種經驗, 更應吸取他們在東南亞的姻親家屬。另應就原居國家人的經濟及社會性期望進行分析。因為有人類學方面的研究, 我們得以由論證式個案研究中進一步瞭解東南亞的全球化過程中的文化層面。

第二, 我們應注意我國社會在全球化過程中正經歷與東南亞社會所出現同等重要的社會問題。外國人與及外國文化在東南亞不斷地與外界接觸後代表何種意義? 東南亞人對此一外國形象, 經驗又如何? 此類接觸又如何影響東南亞人傳統上的世界觀, 認同感及生活方式? 此外, 對外國文化的經驗增加是否加深東南亞人對其他瞭解人及是否‘有助於不同文化間的文化性溝通’。未來我可進行相關研究。此處的“韓國風潮”可做為人類學的必要研究。

第三, 研究韓國人社群及東南亞居東南亞韓國人的工作須受學術界關注, 因1990年代以來東南亞各大城市的韓國人口不斷增加。區內長期居住的韓國人口較短期居留者增加得更快。又, 研究東南亞韓國人社群的工作, 亦即定名為‘東南亞的韓國’的工作係一論證式研究, 須經正確指引及開發。對全球化多種現象所進行的深度研究, 包括海外教育, 駐外工作, ‘Kirog我家人’, 海外志願工作, 民間組織活動及傳教活動, 更遑論跨國婚姻, 外籍勞工移及觀光, 均須加以研究。

最後, 我以為文化人類學在全球化的發揮程度與人類學在一般主要領域中的表現息息相關。例如, 東南亞對入侵的外國文化以及混種文化過程中出現的文化同化問題, 對新自由主義或全球化的抗拒以及保存當地文化或地方性, 加強國家(人種)認同以及當代傳統文化的調適均應持續加以研究。

討論

JEON Je Seong (全北國立大學): 我對OH Myung Seok教授有關在韓國研究東南亞的人類學家數目超過研究中國人類學家數目, 比例為十一比十的說法感到十分驚訝。較之政治學或歷史, 此屬一大成功。其背後的秘密是否代表研究東南亞的專家有可能超越研究中國的專家? 我猜想其中可能的原因或係人類學的精神中一向較嚴肅看待小國

。韓國的東南亞研究學派中並無專門研究寮國或汶萊等小國的專家，而且政治學界短期內亦不可能出現專門研究這些小國的專家。但韓國的人類學界是否有培養專門研究東南亞小國專家的長遠計劃？

OH Myung Seok: 韓國的東南亞專家人數超過中國專家的一個原因是中國不久前始允許外國學者進行實地研究工作。以往幾無可能在中國進行人類學方面的實地研究工作。亦正由於此，研究中國的專家人數不多，但不久前由於可以進行實地研究工作，人數開始增加。東南亞人類學專家人數較多的另一項原因是人類學界瞭解到即使韓國社會鮮少有興趣的地區亦須加以研究。此係一充足條件。在該一背景中，‘少數地區’專家可加以複製，‘人數眾多地區’就更不用說了。如此一來會有更多專家會對東南亞地區的新領域展開研究。因為人類學家多會挑選未經他人選定的地區做研究。即使印尼境內都還有許多未經深入研究的地區。我僅盼大家持續對這些區域進行更多研究計劃。

CHOI Byung Wook; (仁荷大學): 或許人類學是韓國國內東南亞專家及學術研究人數最多的領域。東南亞研究人數不到韓國歷史研究人數的千分之一。我即曾聽說，東南亞人類學研究成果已較1990年代突出許多。唯，韓國的人類學家似乎仍在努力思考其研究報告的對象是誰以及研究報告的主題為何。他們顯然只把韓國人看成自身研究報告的對象，對吧？可是，國外學界在準備研究報告時是否亦面對相同的問題。又，韓國人類學在進行東南亞研究時的目標，身份及國際活動又如何？備選計劃又有那些？我希望多聽取進行東南亞研究的韓國人類學家而非以在韓國人類學者身份所持的看法。

KIM Hyung-Jun: 在想到研究報告的對象時，我會更嚴肅地考慮到一般的韓國人而不僅僅是國外或韓國的學院派，因為我認為更須為國外或韓國的學院派提出研究報告。前往東南亞的韓國人不在少數。但我們更應思考是否有甚麼可供前往東南亞的韓國觀光客參考以及讓對東南亞有興趣者感到滿意的書籍。我認為此係日常生活文化。我的意見係根據對包括我自己在內的人類學家對此問題尚未多加思考的事實所提出。Choi教授有關我們如何能提升韓國人類學家在國際學界中地位的看法則須共同努力並朝該目標踏出艱難的第一步。

CHO Hung-Guk (釜山國立大學): 我要提出一個有關籌劃此次大會的基本問題。身為區域研究，東南亞研究的目標是完成多方面的研究並同時突破單一主題的限制。只是此次大會原即規劃要討論就特定方面架進行研究。有鑒於此，由於僅有三位與會者提到人類學家的研究成果，未形成氣候。因此將此次大會規劃為進行多方面研究的大會而非個別主題及類別研究的會議，或許更切實際。例如，就現代化，民主化或性別等地區性研究的主題，進行分析及反思會更有意義。

OH Myung Seok: 我認為兩項作法均屬可行且必要。我們雖在進行地區性研究及多方面研究，我們亦同時須為自己的研究提出方法論及傳統。此次大會原即規劃要審查各學術方面的研究結果。因此，我們僅討論人類學家的故事。我同意CHO教授有關我們須另找機會討論進行東南亞研究的人類學家，政治學者及歷史學家應如何以不同方式看待及討論同一主題俾為地區性研究工作提出日程表的意見。另外，即使我們在準備提出意見時均已討論到人類學方面的研究，我們仍瞭解到原來對主題的認識仍嫌不足。我認為即使身在人類學界，但對其他人類學家的研究工作所知卻不多。因此我認為我們極須與其他人類學家討論自己的研究工作以找出新研究方向。

II我對東南亞歷史及語言學與文學所做研究

歷史

CHO Hung-Guk (釜山國立大學): 韓國歷史學家對東南亞歷史所做研究多集中在1980年代前的越南及泰國。首位研究東南亞歷史的韓國歷史學家是KIM Young-geon, 二十世紀初KIM 在日本極為活躍, 並曾就日本與中南半島的關係進行研究。1960年代以來, 韓國學者就越南所做歷史研究多半係針對1960年代越戰的情況。此中不少學者為中國籍專家, 且嘗試從中國文化的角度去瞭解越南文化。這也難怪, 因為中國歷史研究範圍太廣。泰國研究則係1970年代以來韓國外國研究大學泰國系學者所提。

除根據中國主要文件所完成的研究工作外, 多數的東南亞歷史研究均非根據該等主要文件完成。此類學者並無閱讀當地語文的能力, 所以多半依賴以英文或日文撰寫的輔助性文件, 因為在韓國很難取得主要文件。由於不注重史地性觀點, 其等論點有時會受各輔助性文件中

殖民主義, 反地方主義甚或民族主義觀點的影響。產生此現象最重要的理由是, 除研究越南的學者外, 當時多數東南亞研究學者均非主修歷史出身。他們即使知道應參考主要文件, 卻顯然無法就主要文件進行分析。他們亦缺乏嚴格完成歷史研究所需的論證及方法論基本心態。

1990年代以來的東南亞歷史研究就較多元化, 且質與量方面均已提升。1980年代前的歷史研究原僅專注在越南及泰國二國, 但現已擴及馬來西亞, 緬甸, 柬埔寨, 印尼, 菲律賓及其他國家。1992年以後已有部份對泰國及越南二國所完成的佳作出現, 由於歷史學家人數增加, 研究主題多元化且質方面亦明顯提升。

即使如此, 東南亞的歷史研究對象仍多集中在越南及泰國二國。對印尼, 菲律賓, 緬甸, 柬埔寨, 寮國及新加坡的歷史研究或尚未完成或尚未開始。對東南亞大陸或附近島嶼所做歷史研究則屬稀有。由於對各國所進行的歷史研究成果不多, 故學者均不急於展開對東南亞多國的研究。另一個有關東南亞歷史研究的問題是多數研究均係在近代或當代期間完成, 例如十九世紀之後。此或許是因為當代進行歷史研究可免受歷史文件或語言因素的影響。但是, 如果能深入瞭解當代歷史潮流, 就可以多對各前現代時期多加研究, 以做為對後續各時期研究工作的基礎。此外, 諸如參考重要文件及歷史性觀點亦可發現東南亞歷史研究中普遍的問題。

公元2000年以後韓國對東南亞歷史研究多集中在越南, 泰國及馬來西亞等少數國家。此亦顯示, 對泰國及馬來西亞所做歷史研究均係由少數學者操刀。許多越南歷史研究即係由越來越多的越南專家或歷史學家完成。以公元2000年以後的越南歷史研究為例, 多數的研究均集中在政治歷史及社會性及經濟方面的歷史, 特別是鄉村及土地政策方面。又, 公元2000年以後的另一新現象是越南對知識性歷史的研究。

整體而言, 大半東南亞的歷史研究均屬政治性歷史及社會性以及經濟性歷史。在社會史中, 又多半係研究婦女的地位與角色。此一認知不僅已出現在1970年代YU Insun 的越南社會研究中, 同時更反應出這類學界的興趣乃瞭解傳統東南亞社會中婦女的利器。在社會及經濟性歷史中, 研究中國人種歷史的工作始於1990年代並持續到公元2000年代, 內容亦極多元, 包括多個國家而且數目也增加了。

至於文化交流歷史方面, 即使研究工作多侷限於越南及泰國, 數量卻仍有增加, 另對緬

甸境內銅器的歷史亦有研究出現。另一有趣現象則是批評韓國歷史教科書中有關韓國對東南亞歷史的看法以及分析東南亞歷史教科書中對太平洋戰爭的敘述。此點反應出韓國或其他地區最近的發展對韓國歷史教科書重新評價所產生的影響。

公元2000年代以後的東南亞歷史研究則顯示研究標準出現有累積研究工作的趨勢，專家人數增加而被研究的國家與主題繁多。此一現象亦可由公元2000年代以後出版與歷史相關的專題論文數看出端倪。由西方專家所寫並翻譯成韓文的東南亞歷史書籍亦反應出研究東南亞歷史的人在增加之中。

但目前仍無歷史學家專門研究緬甸，柬埔寨，寮國，印尼以及菲律賓等國的歷史。又，研究泰國及馬來西亞歷史的工作則多集中在一、二位專家手中。因此，我認為培養新一代專門研究這些國家歷史學者乃當務之急。特別是殖民時期與建國時期特別重要。應多就此等時期提出研究報告。唯，十八世紀之前以及二十世紀中葉之後的各個時期亦應成為深度研究的主題。又，越南學術方面的歷史的出版固屬可喜，我亦盼對學術方面的歷史或其他國家歷史進行。藝術史及文化史亦屬處女地。社會史中就有部份與婦人歷史有關，但包括奴隸，平民，貴族階級以及皇族家庭在內的社會階級史則應在未來進行重點研究。

CHOI Byung Wook (仁荷大學): 韓國的大學正式開始研究東南亞歷史始於1979年，當時韓國大學歷史系首次開辦東南亞歷史課程。此即東南亞研究之始。次年，首爾國立大學亞洲歷史系隨即開辦一個大學生課程及二個研究生課程。課程內容相同。二所大學的課程名稱均為‘東南亞歷史’，一學期教越南歷史而另一學期教東南亞歷史。為研究生開辦有越南歷史及東南亞歷史課程。1980年代中期以後，經SONG In-Seo的努力，江原國立大學亦開辦東南亞歷史課程。到1990年代，專研泰國歷史的CHO Hung-Guk以及專研馬來西亞歷史的SOH Byungkuk分別由德國及美國返抵韓國，西江大學及韓國大學外國研究即開辦東南亞歷史課程。延世大學亦在同時間在每學期開辦東南亞歷史課程。回頭再看1990年代初的狀況，江原國立大學係唯一例外，其係首爾各大學中最早開辦東南亞歷史課程者。

1990年代晚期以來，KIM Jong Ouk, SONG Jung Nam及其他返回韓國及釜山的靈山大學以及洪城郡青雲大學均開辦有越南歷史課程。自2000年代中期以來，CHO Hung-Guk及CHOI Byung Wook均在位於港市的釜山國立大學及仁荷大學開辦有東南亞歷史課程。此已顯示東南亞歷史課程已由首爾向其他地區擴展。由於釜山，仁川及洪城郡均為濱海城市，東南亞歷史課程的擴展已成事實，且非由首爾向其他地區擴展，而係由首爾向港市或由內陸城市向濱海城市發展。

至於歷史研究人員的特性，特定專業的進展一直十分緩慢。YU Insun及SONG In-Seo，二位可被稱為第一代歷史學家，分別專研越南及泰國。1980年代僅有二位學者，但到了1990年代，CHO Hung-Guk及SOH Byungkuk亦開辦新課程。1990年代末到2000年代以來，SONG Jung Nam, KIM Jong Ouk, CHOI Byung Wook以及NHO Young Soon等人自海外返國並展開研究工作並四處演講。只是除CHO Hung-Guk及SOH Byungkuk二位分別專研泰國及馬來西亞的學者，其他四位均專門研究越南。近來，YOUN Dae Yeong由法國返國並在首爾國立大學發表演講，YU Insun已由延世大學退休。他亦專門研究越南。1970年代末及1980年代初，接受專門研究的國家僅由1970年代末及1980年代初的越南及泰國增加了目前的馬來西亞。因為SOH Byungkuk的專業為現代及當代馬來西亞，尚無人運用典型及原始馬來亞資料研究傳統時期。而研究

泰國及越南歷史的範圍亦極為有限。可憐的是,即使自首次開辦東南亞歷史課程以來的三十年間,做為東南亞歷史研究對象的國家也僅為該區域十個國家中的三個。再者,我們亦應注意上述所有學者均係在海外取得其博士學位。即使第一代學者亦係在海外取得學位,那我們又如何領會這當中即使自首次開辦相關課程以來的三十年間根本無人係在韓國取得其博士學位的事實?我們將此一現象與人類學及政治學作比較後就知道研究環境不佳或非好理由。我只盼各位自行判斷。

接著,我要討論多項研究工作。做歷史及地區性學術研究者均會希望並負有社會責任提出根據其專業領域性及知識所出版的書籍。特別是歷史書籍,因為其中包含多種學術界所期盼的基本知識。YU Insun的越南歷史(Minumsa, 1982年)出版已有多時,且最近又以重寫越南歷史的名字重新出版(Yeesan, 2002年)。做為韓國研究東南亞歷史的第一部專書,長期以來已廣經傳閱。SONG Jung Nam的越南歷史一書(釜山外國研究大學Press, 2001年)則係韓國研究越南歷史或東南亞歷史的第二部專書。相對於這二部書籍,並無泰國或馬來西亞歷史的專書。至於通史書籍方面,越南則屬一特例國家。由YU Insun及SONG Jung Nam在同一時間所完成的歷史簡介書籍在某些方面就對其他學者產生了催促作用。由於上述二位學者尚未翻譯任何書籍,CHO Hung-Guk, SOH Byungkuk及NHO Young Soon即翻譯了Milton Osborne的古典東南亞歷史簡介,東南亞:歷史簡介(Oruem, 2001年),Abudul Wahid的馬來西亞歷史一瞥(Oruem, 1998年),Clive J. Christie's 東南亞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 Reader (Shimsan, 2004), which made a big contribution。近來,我published 東南亞歷史:傳統al 時期s (韓國 Textbook Publication Co., 2006年)。該書係韓國所出版的第一部東南亞歷史書籍,尚待更新及修訂。

身為東南亞歷史先驅研究者, YU Insun, 的研究工作及多項研究結果均具指標意義。韓國的東南亞歷史學家們均公認其在多方面的成就: 第一, YU Insun 已成為韓國學術界中一位備受尊敬的學者; 第二, YU Insun 能用學術界主流以及國際通行語文的英文提出韓國的學術研究成果; 最後, 是其係在韓國完成研究工作。如果我以YU Insun為例, 就會提出其多項出版品平均地以越南文, 英文及韓文上市的事實, 因為即使亞洲在這些領域的學者人數不多, 仍有助於使韓國的東南亞歷史學術界受國際學術界重視。‘三種語文出版工作’十分繁重, 但其中樂趣無窮。CHO Hung-Guk及SOH Byungkuk二人均持續以英文發表其等多項研究成果。SONG Jung Nam及KIM Jong Ouk更持續以越南文發表其等多項研究成果。韓國籍東南亞學者中, 研究馬來西亞政治的HWANG In-Won, 或許是在外國發表研究成果的第一人 (ISEAS, 2003年)。第二年, 中亞歷史專家, KIM Hodong(Holy War聖戰, 史丹福大學)一書 以及越南歷史專家 CHOI Byung Wook (南越, 康乃爾大學)一書均係在海外出版。韓國學術界, 尤其是 歷史學術界, 有二本在海外出版有關東南亞的書籍值得一看(一位是由研究土耳其歷史的YI Eunjeong於2003年在荷蘭以英文出版的書籍, 只是她的書性質不同)。這又是YU Insun 所引發的國際化成果。

韓國的東南亞歷史學家教育背景各異。至於取得博士學位的國家, 則包括有英國(NHO Young Soon), 法國(YOUN Dae Yeong), 德國(CHO Hung-Guk), 美國(YU Insun, SOH Byungkuk), 澳洲(CHOI Byung Wook), 越南(SONG Jung Nam, KIM Jong Ouk) 及泰國(SONG In-Seo), 其中許多國家均在積極進行東南亞研究工作。背景諸多且學者間亦互相交換研究方法並在韓國進行交流, 各研究人員的研究主題亦不同且在持續改善中。

在此同時，我們有時會發現某位學者的研究領域太廣。在此可以研究泰國的專家，CHO Hung-Guk為例，他亦研究緬甸，而兼研中國及韓國的越南專家亦嘗試研究柬埔寨，以及馬來西亞專家，SOH Byungkuk對印尼東端伊利安查亞所做研究均屬此類。研究越南的專家，YOUN Dae Yeong，目前正準備開始研究寮國。此種擴大研究領域的現象或可擴大觀點或有助於多方面研究，唯其真正的理由仍係因韓國的東南亞研究學者人數不足以致有諸多待開發區域。故極須培養研究東南亞十國歷史的人員。此舉不僅須由現有學者專精於各自的研究領域並進行深度研究，我們(其中包括我我)更不應將研究結果運用在自己不熟悉的領域中。

語言與文學

KIM Young Aih (韓國外國研究大學): 我雖接受邀請對韓國過去十五年來在東南亞語言及文學的研究進行審查，但仍對其心存懷疑。直到我坐在書桌前時仍難決定如何將自己的意見有條理地整理出來。經過長考後，自己終於決定專注於韓國東南亞研究協會所出版東南亞評論中的文章。我首先將該協會成立前自己的一些記錄重新加以整理。

記得十五年前我曾隨YANG Seung Yoon教授(韓國外國研究大學馬來亞-印尼系)前往某地。但我不記得為何前往該地，只記得當時遇到七八位研究東南亞的學者。當時我極害羞，所以也不記得那些學者的名字。之後，我們即經常碰面並就有系統地建立地區性研究，學述交流及合作事宜交換意見，俾擴大及深化研究範圍同時計劃如何培養新一代學者。回想起來，一開始帶頭的均為政治學者，二，三年後有經濟學者，語文學者及人文學家加入。

定期參加月會且形成主力的年輕社會學者聯合其他對東南亞有興趣的學者在1991年上學期末左右成立了韓國東南亞研究協會。我參加在外國事務及國家安全學會(IFANS)舉行的成立會議時即對有多位資深東南亞研究學者在場以及韓國商界及政界居然另有其他積極進行東南亞研究的學者的狀況感到驚訝。透過此類活動，該學會的期刊東南亞評論因而誕生。該期刊原係年刊，後因1995年時東南亞研究學者人數增加，又改為半年刊。迄今已出刊二十五本。迄今該期刊封面已改過四次。該學會目前約有三百二十位會員。韓國東南亞研究協會所屬東南亞評論係一內容包括多方面專門發表會員研究報告的園地。

儘管已有多所高等教育機構開辦有東南亞研究課程，教授並就該區域內語文進行研究的大學仍屬少數，通常我們將越南文，柬埔寨文，寮國文，泰文，緬甸文(緬甸文)以及馬來亞-印尼文視為該區域內語文。其中，越南文，泰文及馬來亞-印尼文為韓國外國研究大學(HUFS)及釜山外國研究大學(PUFS)中的主修課程。柬埔寨文及寮國文則非主修課程，但上述二所大學仍開設有定期初級課程班。只有PUFS教授緬甸文。就我所知，除HUFS及PUFS之外，另有其他大學亦教授越南文及馬來亞-印尼文，但主要是針對傳播方面。

因此，研究語言及文學的教授多集中在HUFS及PUFS。進行東南亞研究工作中對當地語言的研究是要項。另外亦可以包括英文及法文在內的第三語言進行此類研究，只是此種做法較少見，而越南文屬例外。因此要說韓國的語言及文學研究工作多由HUFS及PUFS主導亦不過份。此現象所反應的是韓國語言及文學教育及研究的現況。

至於 HUFS，其東南亞語言系中包括馬來亞-印尼文系，泰文系及越南文系，總共有十五

位韓國籍教授。至於系等分析，馬來亞-印尼文系有六位全職教授，其中有一位語言學者及二位文學專家。泰文系中亦有六位教授；其中有二位語文學者及一位文學專家。而越南文系的三位全職教授中並無語言學者，僅有一位文學專家。總共有八位當地專家 – 分別專研政治學，經濟學及人文，卻僅有三位全職語言學及四位文學教授；語言及文學教授人數不到全體教授總數之半。

外國籍學者一般均係語文學者，文學專家或人文專家，其中包括政治學者及哲學家。其等在韓國授課期間亦提出學術著作。HUFs的泰文系每年均聘用三位(或四位)泰國籍語文學者及文學專家。其等在韓國授課期間亦提出一到二份學術著作，但不加入韓國東南亞研究協會。就我所知，HUFs的其他東南亞語言系亦然。我猜想PUFS的狀況也相同。

PUFS的教授陣容亦類似。根據PUFS網站資料，該大學開設有泰文，馬來亞-印尼文，越南文及緬甸文系且共有十三位韓國籍教授。泰文系中，三位教授全係專家。馬來亞-印尼文系的三位全職教授中有一位語言學者，一位文學專家以及一位政治學者。越南文系的四位教授中，一位是文學專家而其他三位均分別主修政治學，經濟學或人文。緬甸文系有三位教授，其專業分別為文學，語言及政治學。PUFS共有二位語文學者，三位文學專家及八位地區性研究專家。因此，此二所大學的二十八位全職教授中計有十二位語文學者及文學專家以及十六位專進行地區研究的學者。

在此同時，過去十五年間，東南亞評論的二十五位志工共出版一百四十篇有關語言及文學的研究報告及研究註釋。其中，已出版的有關語言及文學的研究報告計有十三冊，約佔總研究報告數量的一成。其中的十五篇裡有二篇為越南文及文學，一篇為印尼語言，二篇為緬甸文學，五篇有關泰國文學及另五篇有關泰國語言。有關泰國語言及文學的十篇數量最多。十五篇語言及文學研究報告中有六篇是關於語言，有九篇是關於文學。十五篇研究報告中多為針對語言或文學作品所完成的個案研究。

上述事實均顯示，即使韓國的東南亞研究教育係由HUFs開設的馬來亞-印尼文系開始，1964年時，研究東南亞語言及文學的工作尚在起步階段，而語言及文學研究則更無法與社會或人文科學相比。但此現象的原因及背景又為何？

第一個原因是教授東南亞相關主題的高等教育機構不多，而開設有東南亞語言及文學課程的大學更少。另一個原因是語言及文學教育的主要目的不如其他教育實用。因此，各大學的語言及文學系所特性與韓文及文學系所不同。其課程的目的並非在教授學生自己本國的語言及文學，而是地區性研究外加地區性語言及文學。

僅有少數的語言及文學學生回應東南亞地區研究專家中語言及文學專家的呼籲。實際後果是為數有限的研究報告。學者人數不多亦代表更少的學者可以對這些研究報告進行審查及評估。此亦表示審查及評估研究報告的工作常無法恰當地完成。

至此，我已說明東南亞語言及文學研究的現況。我接下來的問題是韓國東南亞研究協會要如何解決東南亞語言及文學研究系所所面對的各項問題？這些問題甚至於比韓國其他語言及文學期刊數量過多的問題來得更大。

在提出解決問題的建議前，我首先要問的是語言及文學研究是否真能有效開展東南亞研究。我的答案是肯定的。接著，我們應朝何方向加快腳步？我們是否應該維持既有

的研究方式? 或我們是否應該停止在期刊上發表文學及語言研究報告以便讓期刊專注於及專精於韓國東南亞研究協會多數其他專家的工作, 就像其他社會科學性期刊一般?

我們如欲維持韓國東南亞研究協會的現有特性, 我即擬建議協會鼓勵大家多從事語言及文學研究, 以便相關的文章得以定期發表。例如可以多發行一期而非目前的一年兩期? 或是就人文及社會科學發行兩期但不發表語言及文學性文章, 同時另發行一期語言及文學研究專刊? 或甚至於在主題專刊上發表語言及文學研究成果, 另附包括有個案研究的單一國家及/或個別研究報告? 亦可預先規劃下一年度的專刊主題, 以便研究人員有充分時間做準備。

我瞭解近來越來越多學生開始注意東南亞國家語言及文學的趨勢。在此我極盼年輕的一代學者能多注意東南亞語言及文學。

討論

PARK Sa-Myung (江原國立大學): 歷史研究的趨勢依國家分別審查。歷史研究可依研究主題分成不同的史實時期。我要進行公開討論。

CHO Hung-Guk: 至於其他國家方面, 這些議題僅稍被觸及或少被提及。曾嘗試將歷史分為政治歷史, 社會及經濟歷史, 文化史及互動式文化, 但最後並未如此持續進行。在越南歷史方面, 研究工作多集中在政治歷史或社會及經濟歷史上。至於其他國家, 此類議題均僅屬表面性或極少經過研究。

BAE Geung-Chan (外國事務及國家安全研究所): 您為何認為沒有主修印尼歷史的韓國人研究人員? 是因為至於學術歷史界並不認為印尼是重要研究題目還是因為印尼歷史並無法引起興趣?或是研究印尼根本就不容易...我猜想總是有原因的。

JEON Je Seong: 未來並不暗淡, 因為二年內將出現二印尼歷史專家。由HUFSS馬來亞-印尼文研究系畢業的**SONG Seung-Won**小姐現正在美國俄亥俄大學完成其印尼當代史的博士學位論文。另一位畢業於首爾國立大學亞洲歷史及國際研究所的**YEO Woonkyung**, 現亦正在美國華盛頓大學以印尼當代史為博士學位論文題目在印尼蘇門答臘進行實地研究中。

CHO Hung-Guk: 我認為沒有印尼歷史研究人員一事純屬巧合。純係巧合。大家都瞭解印尼歷史的重要性。

PARK Sa-Myung: 我認為印尼與韓國極少直接關聯。越南與韓國關係密切且研究越南的人一直不少, 印尼與韓國關係不密切 是有原因的。

CHOI Byung Wook: 我認為缺少印尼歷史學家是很自然的事。越南受到的關注就最多。接著是印尼。YU Insun教授開始就東南亞歷史發表演講並開始訓練學生時, 多數學生均選擇研究越南歷史, 接著才是印尼歷史。在國際上, 印尼史專家諸如。像YU Insun 教授就由韓國大學轉往首爾國立大學, 之後韓國大學研究東南亞歷史的學生只得解散。由於YU Insun 教授的轉校, 他又在首爾國立大學開始訓練學生。另外有**JEON Je Seong**先前曾提及的**YEO Woonkyung**, 亦曾研究印尼歷史, **YOUN Dae Yeong**在完成越南研究工作後由法國返國。接下我在韓國大學的**HUH Jiyae**亦轉往首

爾國立大學取得碩士完成越南研究工作後由法國返國。接下我在韓國大學的HUH Jiyaе亦轉往首爾國立大位,目前就讀於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專修泰國史。上述所有人均係知名的越南史,印尼及泰國史學生。

PARK Sa-Myung: 韓國大學的議題極具象徵性意義。以往,韓國大學亞洲研究所不斷造就出許多學者。該研究所的重要性被韓國第一代東南亞研究學者排在首位。唯現已完全不參與東南亞研究工作。

CHOI Byung Wook: 亦即我前去求教聽眾對我談話意見者。此點十分有趣。事實上,如果我們僅研究東南亞歷史,韓國早已開始與美國合作。這也就是由於KIM Jun Yop教授的遠見。他早在1960年代即已自己選擇學生訓練並派學生前往越南,泰國,印尼及馬來西亞留學。但對馬來西亞與印尼的研究工作卻由於幾次的不幸事故而中止。YU Insun教授及SONG In-Seo教授均係於1970年代及1980年代在韓國取得穩定地位,並在韓國開始研究東南亞歷史。但後來亦因為幾次的不幸事故而中斷,無法繼續培養新一代的研究人員。我每憶及此均倍感失望。如該批年輕學生能接受良師指導,相信我們現在至少有六位或更多的東南亞歷史學家。真是可惜。

OH Myung Seok: KIM Young Ai教授告訴我們該期刊過去十五年間每年只有十五篇東南亞語言及文學研究報告,我以為東南亞語言及文學研究報告如此的少該是大問題。我願聽取協會成員的意見,因為協會已提出此一議題。

YOON Young-Chon (仁荷大學): 即使我是文學專家,專業亦不在東南亞文學。但對多發行期刊以解決問題的看法仍存疑。我認為我們應進一步找出東南亞文學研究報告過少的原因。

KIM Young Aih: 我的意見是值得就東南亞文學研究進行比較文學,比較文化及比較語言學研究。再者,由於可以使用微軟Word軟體輸入東南亞語言,大部份文章中引述的內容均可納入的原文中以提升東南亞評論的地位及聲譽。

OH Myung Seok: 各期刊目前所刊登有關越南的研究報告約有四十篇,但東南亞評論中有關越南的研究報告則不多。其原因或許是此類多在研究報告其他學術性期刊而非韓國東南亞研究協會的期刊發表。我猜想其中必有原因。

CHOI Horim: 東南亞語言及文學研究報告多不在東南亞評論發表一事實屬奇怪。我們應該加以討論,第一,東南亞語言及文學在整個地區性語言及文學研究領域中的地位及其意義為何。第二,我們迄今已收到統計調查,但希望多就詳細研究內容,包括特性與連帶關係,亦進行分析。我亦瞭解許多語言及文學專家均參與社會或人文研究工作。我認為此舉可刺激多方面的東南亞研究工作。但學者首先須同意如此做。

OH Myung Seok: 我個人認為韓國東南亞研究協會的期刊(如東南亞評論)為招牌型期刊,代表東南亞研究,所以該期刊的範圍基本上應該包括研究語言及文學。文學研究的現況並未完全反應在期刊中實係眼前的問題。其中原因諸多。我將把今天的討論內容列表後交與期刊編輯,我另會要求編輯們深入討論如何改善期刊。

IV韓國的東南亞政治學及經濟學研究

政治學綜覽

PARK Sa-Myung (江原國立大學): 我的論文小標題是“由少量到質豐”，而其背後的動機是我認定在韓國進行東南亞研究的實際做法是提升研究水準。但由於專精於此區域的研究人員太少，短期內研究數量無法增加。雖有幾位政治學者正對此區域進行研究，我們仍嫌不足。我們更沒有年輕的東南亞專家固定前來。就以資訊為例，有甚麼解決辦法？我們只能以現有人力強化研究品質，卻無法顧及策略及選項。老實說，韓國目前的東南亞研究品質欠佳。研究數量不多不是我們的責任，研究品質欠佳則是研究人員的責任。

依據我的觀察，多數研究人員均在討論及批評目前的研究狀態並指出韓國的東南亞研究工作做得不夠。我更要說明韓國的東南亞研究工作應如何有效提升其品質。我在聽取其他研究人員對我註解的意見後已找出方向。我認為我們須看部份問題的基本面。有些問題的是所有比較政治學者 – 或甚至於一般政治學者 – 都會遇到的，不僅是韓國，全世界皆然，只是韓國的問題嚴重得多，因為我們顯然無法真正解決這許多問題。

首先，我要提及價值導向的基本問題。我們須嚴肅地思考研究東南亞政治學的意義。究竟我們應追求無價或價值導向的政治研究？我以為，問題不在一對與一錯。我們須考慮做研究的二個層面。理論上，價值導向的做法牽涉來自該區域以外的觀點，而價值導向的中立性則須透過東南亞內部及地方性的做法達成。我們更可以將內部做法進一步分割。它是全東南亞還是各國家做法或族群的觀點？答案絕不單純。又，以東南亞人的眼光研究東南亞政治學對非東南亞人來說無異是極大的挑戰。將我們既有的所有價值觀完全排在外即可能形成一理想世界，但實際上絕無可能存在。再者，我想知道那到底是否應該就是我們的終極目標。確定是有某些我們珍愛的價值觀促使我們研究政治學，尤其是東南亞的政治學。如果缺少這些屬於我們的價值觀，我們可能就不會特別選擇研究東南亞的政治學。外部作法則強調東南亞政治學的全面向，而且由於目前的社會科學研究多受西方學術傳統的影響，我們的分析角度亦主要在將西方研究人員的觀點加以重組。但我們應切記應加入韓國社會科學家的認同感及立場以及我們在由韓國人觀點研究東南亞政治學時所面臨的價值觀議題。

第二，我們如果真決定認可自己的價值導向，接下來的議題就是研究人員可以使用那些類我們會採用的具體研究方法 – 或那些名詞，諸如範例，觀點或作法。又譬如現有文學，歷史相對論，現代主義及後現代主義有諸多理論性架構。由於後現代主義原本就極為複雜，所以很難將後現代主義中的文學新潮流做出清楚摘要，我亦僅試圖在自己的報告中稍微提及歷史相對論與現代主義。此一議題係由 Donald K. Emmerson 在討論如何解釋東南亞歷史的問題所提出。歷史相對論的觀點多係內部做法，因其所針對的是東南亞的歷史狀況，所以強調的是主觀性，自治，獨特性與連續性。而現代主義者的觀點則較屬外部，且強調客觀性，依存性，普遍性與改變。

第三，我要討論一個學科間議題。區域性研究固須持續進行多方面對話，但我們在此的成效又如何？光從韓國各學術性社會研究所即可看出我們在此方面的成效尚不足。我們可自認為已由多年聽取其他學者的報告後有深入瞭解，但實際尚我們大家在學科間議題上僅只是發表了一些各方學者所提論文而已。此舉是否真被稱為多方面學術成就？是否更應該被看成學術人力間的成就？二十年來一直如此。要進行真正的多方面研究，我們就應有能力運用多方面的作法及觀點。當然，一個人的力量有限，但我們至少應該有能力將其他的類似學術成就應用在自己身上。光召集一大批人並不代表就是多

方面作法。

第四,我將特別提出我們迄今已完成研究的多項議題。殖民政權崩潰後,民族主義即成為政治學上的中心議題,其中包括成立國家及國家整合。韓國成為現代主權獨立國家後,歷史上首次將國家安全一辭訂定為政治上的關鍵字。為確保國家安全,經濟發展被列為首要工作,唯快速經濟發展亦產生了許多副作用,諸如開發主義。在此時期,世界仍被在冷戰意識籠罩。冷戰結束後,民族主義隨之興起。另有包括區域主義的呼聲出現,唯我只扼要地將民族主義看成當時的核心。民族主義時代重新抬頭。唯,由於1990年代末的經濟危機嚴重損及國家內政,政治研究中出現許多諸如:國家轉變為民主體制,區域整合位階高於國家整合,個人安全高於國家安全,人力開發優於經濟開發以及永續開發位階高於加速開發等新議題。身為研究人員,我們是否在積極地面對此等新議題則屬未知。

最後,我要強調目前我們急須改進時下以個案研究為主要的研究方式。迄今多數我們所完成的研究均為此方式。我並非堅持我們應該立即停止此一做法,但我們不應該只使用此一方式。東南亞有十各國家及許多族群。個案研究進行百年來我們仍未訂出該區域的普遍價值。我們又如何能從無數的學術及實際個案研究中達成目標?我們現場就有許多著名的人類學家,如果大家只做個案研究,屆時即會出現過多的研究議題,但我們不能只重視民族誌學的數量。我們現在必須嚴肅重新思考方法論。東南亞研究的地位已較前提高許多,我們亦應該從只為餬口而進行的研究及埋頭苦幹的水準大幅跳到學術方面的研究的地步。請各位切記上述各點,現在將時間交給其他學者。

2. 研究政治文化

JEONG Yeonsik (昌原國立大學): 即使對政治文化的爭議不斷,但至少在專門做東南亞地區性研究的政治學者中,政治文化的重要性未受到挑戰。但問題是,韓國的東南亞研究人員有否對區內政治文化是否反應其意義一事進行研究。我已閱讀過發表在2001年以來東南亞評論上有關政治文化的文章以找出迄今韓國人在此研究中的貢獻。

從2001年第十一卷第一期到2007年第十七卷第二期為止,東南亞評論中計有一百一十八篇文章,其中有六十三篇是有關東南亞政治學的。在政治學方面,議題完全平均分配。其中有五十篇是由政治學者所寫,其餘的十三篇則是由相近領域的學者所寫。只是沒有任何的政治文化文章是由政治學者所寫。反之亦真,幾乎所有的政治學文章均部份談及政治文化。請看此類文章是如何分析政治文化且又分析及解釋到如何程度。

研究政治文化的理由並不簡單,因為內容既複雜又多變。複雜是因為社會各成員中原就容許不同的政治文化存在。例如,政治文化可隨社會階級,世代及區域改變。因此,在進形政治文化研究時成為研究對象的群體即應並清楚地加以標示。但問題非僅止於此。成為研究對象的群體擴張時,又須將多種政治文化間的關係做適當界定。如果無法達成此目標,則研究的結論即可能變成極權主義,而且會在極權主義與統治階級的政治文化衝突中迷失政治文化的本質。再者,政治文化一如其他任何文化般多變且易變。如果我們無法跟上此等改變,則政治文化將僅成為一獨立變數,而且最後只會成為決定命運的說詞而已。因此,我們須以一貫的態度研究政治文化的動力,特別是針對政權更替前政治文化的變化以及因變化速度不一而在政治性政權及政治文化間所產生的衝突。

說到複雜的政治文化,我相信我們對東南亞政治文化的研究工作已有可觀成就。經研究的群體已擴及多個社會階級及區域。新近的多項研究且顯示研究目標已由主要以由男性為中心的菁英政治文化擴張到被統治階級,被邊緣化階級,女性以及各省級政治文化。儘管菁英政治文化因其地位且屬最具影響力的變數以及多受學術界關注而仍為主要變數,我仍認為我們目前已獲長足進步。

唯,我認為僅在一項分析架構中分析不同的政治文化仍有問題。例如,有些研究仍以理性選擇理論作為主要分析工具,但當有些研究卻又無法以理性選擇理論解釋時,這些作者就策略性地以政治文化臨時做為解釋。此一方法事實上可能可以精準地反應現實,因為政治文化極為複雜,甚至於個別政治文化均極複雜,而且沒有任何單一政治文化可以完全凌架其他政治文化。只是,出現一種以上政治文化,特別是互相衝突的政治文化且同時運作時,其間的關係就屬特定方式。因此,我們應瞭解該一關係。

在這方面,韓國的東南亞政治研究學最欠缺似乎是面對多項互相矛盾政治文化時的辯證性分析。如果主流政治文化 – 即Louis Althusser所說的意識型態式的國家機器以及Antonio Gramsci所說的霸權 – 能維護現有政權,我們即須研究主流政治文化是如何產生以及反霸權的反對派政治文化或反霸權模式是如何形成以及進行反霸權的。不就此進行分析,研究人員仍會將主流政治文化視為常態。

我們須特別注意的是政治文化的多變性。霸權式政治文化長久存在後,人們會開始落入霸權式政治文化永不改變的幻想。由於文化非屬靜態式,主流政治文化亦不例外,而且我們應該瞭解有可能會改變。政治文化可以同時是一獨立及依存式變數。受全球化風潮以及通訊技術發展所導致得資訊快速影響下的社會經濟性結構改變已使得政治文化的變化速度遠超過人類歷史中的任何階段。此即我們須追蹤研究東南亞政治文化轉型的理由。

政治文化的變化對政權改變前政治文化中政治及政權改變的研究十分重要。如果我們再仔細檢查新近民主化以及民主化以及在民主進程中重建庶民文化時亦未完全排除此一現象時就可看出它是一大主要變數。此一現象自然不是沒有缺點的,而且有些方面更應接受批評 – 像是過去如何區分庶民文化與政治文化以及它如何由以西方為中心的命運註定式分析所衍生的現代-與-傳統的二分法演變出來。現在我將僅就與今天所討論的庶民庶民文化及政權更替議題有關的研究提出建議。庶民文化乃民主制度的堅定基礎,換言之,亦是民主政權的動力,且其特色通常屬價值導向,諸如承諾,耐性,信任,理性以及政治實利。我們可以將它看成民主政權下最恰當的政治文化。但我們須注意的是此等價值導向常不同時出現,而是間隔式地形成,而且不是在過渡到民主的時期而是在民主化時期中出現。為確實瞭解造成政權更替的政治文化的形成原因,我們仍須觀察由此多元現象所產生的政治文化的多變性。

在此狀況下,我們應批評韓國風潮,或稱Hallyu的研究風氣。包括學者 – 尤其是政治學者 – 均對近年來風行海外的韓國影片,流行音樂以及電視連續劇的一窩風現象展開研究。研究主要係說明韓國文化產品的消費狀況以及造成此一現象背後的原因。我並不是說此一現象不值得鼓勵。研究東亞文化共同處一事,特別是對大東亞區域體所進行的研究本身即應加以表揚。可惜的是,此類由東南亞政治學專家所進行的研究常僅針對韓國風潮現象,並未包括韓國風潮對東南亞各國內政治文化所產生的影響做研究。舉例說。我認為,此類研究工作須強調東南亞消費者究竟是如何接受或排斥韓國電視連續劇中所呈現的韓國政治文化現象,以及對其政治性價值導向的影響又如何。研究

韓國風潮現象的主旨在於它是一種侵入且會影響大眾平日生活的外來政治文化，而非它是一韓國政治文化。

為避免迷失多變性政治文化的主题，政治文化不應該僅被看成單一變數，更應被看成一依存式變數。將政治文化看成一依存式變數對政治學者而言非屬易事，要成為計劃則更難。通常須花數年時間接受仔細觀察訓練後始能瞭解各種符號，原文及圖像的意義，之後才能明白各相關意義的製作結構。此即為何多數政治學者僅將與人類學相近的資料看作單一變數的原因。但政治文化顯然是韓國東南亞政治學專家無法忽略的面向，因為我們應切記東南亞政治學的詭譎性，切勿因西方國家在此方面已有諸多重大成就而滿足，而應進一步瞭解區內的政治文化，並同時承認政治文化乃政治學中的文化。

3. 研究政治變化與政治經濟。

PARK Eunhong (聖公會大學): 要就東南亞地區政治性變化及政治經濟的多項研究工作寫出綜覽誠非易事。我個人認為韓國的資深東南亞政治學研究學者更適合做這份工作。所以我要將自己的工作限定在就迄今已發表的相關資料做簡報。

首先，我要提及有關韓國以外地區對東南亞政治性改變以及政治性經濟所完成的研究工作。近年來就相關議題所發表且具影響力的書籍有“當代東南亞：區域性動力，國家差異性”(2004)，“東南亞如何回應全球化：重整統治權及深化民主”(2005年)以及“東南亞的政治性經濟：各市場，勢力及主張”(2006年)。根據上述書籍，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及泰國 – 即廣稱得“東南亞四國協” – 已見證到其國民透過定期選舉如何享有更多自由及參政權。總之，這些國家正由假民主過渡到成熟民主。只是菁英派仍刻意地避免改變政策以免破壞傳統政治運作並危及其等與政府間的堅定關係所帶來的自身利益。東南亞的民主化進程僅為過渡性而未趨穩定，且其改變僅係表面而非根本式。只是各國仍不免受到鄰國民主化運動的影響。東南亞的政治性變化潮流可以用“3 Ts”來解釋 – 亦即過渡性，變質性及跨國性 – 這是海外東南亞政治學者對東南亞政治情勢的普遍看法。我們同時亦見證了**JEONG**教授在前文中所強調的政治性改變及政治經濟研究工作中的政治文化現象。此現象或許又屬政治性改變而政治經濟的改變則無法完全與文化性變數做切割。不論是策略性選擇或理性選擇，二者均無法擺脫文化的重大影響。有人辯稱，即使完成了民主化，東南亞政治文化仍難脫代理人主義的影響，而此點正是政經改革的阻礙。

在為紀念1987年6月民主奮鬥運動二十週年由韓國民主基金會與民主及社會運動研究所在聖公會大學所召開的國際東亞民主討論會(2007年6月29日)中，多位與會者均強調政治領導階層的重要以及政治菁英派的角色。緬甸國會(NCUB)秘書長**Aung Moe Zaw**，即提出其就社會運動在緬甸民主化運動中的重要性所做報告。其中確認由於民主運動者缺少領導階層以及談判技巧，緬甸在1988年的“關鍵時刻”並未完成“民主突破”的工作。菲律賓大學前任校長**Francisco Nemenzo**，亦提出其對民主及民主化的看法。他將**Antonio F. Trillanes**試圖推翻現任總統**Gloria Macapagal-Arroyo**的行動看成**Hugo Chávezian**有能力領導菲律賓的第一個徵兆，因為它接著有可能打破該國的寡頭式民主。**Nemenzo**則間接地以推翻寡頭式民主複製品的代議式民主必須靠漸進式軍人菁英做結論。其論點亦反映出以菁英為中心的過渡論，他更提出讓許多與會韓國學者意外的意見，因為**Nemenzo**是菲律賓一位主要的漸進派領導人。當然，韓國政治界早已開始注意1990年代以來民主化發展中的發起人而非發生原因，而焦點全集中在菁英派人士在加速，延誤甚至於拖延民主化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

有關政治菁英派在東南亞的寡頭式運作方式,使用過的名詞有教父,老大,領袖,老闆制,世襲制及雇傭-代理人制。在其2007年出版的“與東南亞危機密不可分的政治領導階層”(Park et al)中,作者們比較了四個國家過渡到民主期間的政治領導階層形態—分別是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與泰國。該書結構極佳,且又與韓國政界專注於政治領導階層的現況吻合。我在該書中發現一個重點。即使我們多數均承認領導階層導向政治性改變理論的效力,不僅是由於領導階層的‘自身價值’,更是因為其等的客觀性“命運”事物。Park在書中同時以主意說與決定論的平衡手法論及此點。

東南亞政治菁英派的政治領域固然因過去一,二十年間各國的政治體制以不同的速度逐漸脫離威權統治。現存的問題是東南亞的代理人主義式政治是否正轉變成能保證透明且係公平競爭的政治體制。換言之,在“變質性”議題中—亦即前述的3T之一—我要問的是東南亞政治有無可能在根本上轉變而非名義上及表面的改變。韓國東南亞研究所以及西江大學東亞研究所均就此出版一系列東南亞研究書籍,此係諸多韓國東南亞政治性改變理論及政治經濟專家的明顯成就。但仍難免有不足之處,特別是未就相關理論及分析架構多加敘述。但我們仍應該對他們嘗試以論證方式去檢驗“全球-地方關係”中亞洲的例外主義已因所謂“第三波”的全球民主化風潮以及東亞開發型國家亦捲入新自由派全球化致使之故而不復存在。

有趣的是經濟危機之後韓國政治學者對東南亞政治興趣突增以及討論泛東亞群體時東南亞常被提及的現象。由泰國開始的金融危機極具傳染性,在韓國引起震盪後又波及馬來西亞與印尼。韓國的政治學者因而開始由政治性經濟觀點觀察東南亞。比較政治學中將東亞經濟危機下的政治情況訂定為全球性經濟蕭條的起因。

經濟危機後東南亞的政治加倍惡化。以印尼,馬來西亞與泰國為例,經濟危機刺激了政治改革及民主化。但細看印尼,菲律賓及泰國的狀況,民主化的進展並不穩固,民主化相當不穩固。尤其是泰國,在東南亞國家中更屬特例,其循序漸進的民主化發展相當穩固。只是不到十年的國家運作卻出現了“全球-地方關係”下最壞的副產品—金融危機,而國家運作亦經歷了一場反塔克辛的政變並進而演變為反民主化浪潮。在泰國所發生的一連串抗議事件更突顯出泰式民主的起起落落,並引發了走向社區主義的保護農民的措施,導致具社會經濟背景的反塔克辛軍事政變。該次政變係泰國近代史上獲得社會廣泛支持的首次。學界瞭解須將焦點由“東南亞經濟危機背後的政治性狀況”轉到“東南亞政治危機背後的經濟情勢。”

如果我們將人類的進化看作擴展民主以及累積物質財富的過程,韓國及東南亞均經歷過多次政治及經濟性騷亂。就此,我願說對東南亞政治有興趣的韓國政治學者越多,就越是積極現象,特別是在比較性觀點方面。韓國的東南亞專家應該就此現象積極推出並提供多種理論,政策及組織性資源以加強韓國及東南亞之間的來往。但實際狀況正好相反,唯我深信供應亦能引發需求。

亦正由於此,我在此要推崇亞洲政治學討論會經韓國東南亞研究專家發起下於2004年6月24及25日成立為韓國政治協會夏季年度大會的附屬機構。其對韓國東南亞政治學者具重大意義,因為已成為韓國及東南亞政治界之間的溝通平台。如果我們持續維持並開發此一溝通領域,相信韓國研究東南亞政治的學者人數定會增加。

4. 研究國際關係

BAE Geung-Chan (外國事務及國家安全研究所): 我經要求在今天的會議中提出報告時, 我首先想到, ‘此舉目的為何?’ 我不知道是否真有必要就東南亞國際關係研究做評估, 因為專精與該領域的學者實在不多。我只數得出一, 二位, 如果再將範圍加大的話, 頂多也只有幾位而已。簡單說, 可能根本沒有。我為自己的報告起了一個十分幼稚的標題, “就東亞社群的辯論: 不毛之地上綻放出一朵小花”。我認為它算不上學述報告, 只能說是個人的牢騷罷了。

查閱過去十五年來韓國所出版的東南亞國際關係論述並非難事。唯一的困難是少數相關研究人員在長期專業工作中可能會遭遇到的困窘感, 難以應付感甚至於羞辱感。理由很簡單。1990年代以來專精於東南亞區內國際關係的政治學者實在不多。我認為甚至於每十位東南亞政治學研究人員中取得博士學位的人不到一位, 韓國及海外皆如此。因此, 從事相關研究工作人員在質與量上均不足的情況就不足為奇了。再者, 將韓國形容成研究東南亞國際關係的不毛之地亦不過份。我們如果將自己國內的狀況與據長期進行研究工作的日本, 澳洲, 美國甚至於部份歐洲國家相比, 就更真實了, 因為上述國家對該區產生戰略興趣要較韓國早。即使有這許多缺點, 我仍認為觀察研究潮流及現有相關學者的成就仍對未來的研究有幫助。

1990年代以來在韓國研究東南亞國際關係的學者分為二類。第一類是主修一般國際關係且經常在國際會議中與美國, 日本, 中國以及東南亞各國的半官方學者交換意見。例如, 這些學者經常參加亞太安全合作議會, 亞太圓桌會議以及亞太區域安全討論會等國際會議。但他們均非東南亞國際關係專家。他們通常在東北亞國際關係或就朝鮮半島情勢, 或就有關包括東南亞在內的亞太地區非傳統多邊安全議題, 像是海上安全, 恐怖主義, 海盜, 毒品, 走私以及破壞環境等議題代表, 代表韓國政府發表演說。但他們從未就東南亞國際關係做過任何研究, 所以也不自認為是區內事務專家。只是他們在與來自東南亞的學者進行一般國際關係議題討論後都對東南亞國際關係有相當瞭解。

第二類則屬韓國各大學及研究所中專門研究東南亞國際關係的學者。但問題是此類研究人員數目極少, 且研究重點僅集中在東南亞國協國家。我們須說明此類研究人員的研究品質不高。只是各大學一些教授就東南亞國協及東南亞國際關係出版了書籍並由政府資助的研究所人員持續就東南亞國協及東南亞國際關係進行研究。在量與質方面均無法與日本及澳洲相比, 因為其內容僅係介紹東南亞國協及其新近所發生的變化。當然, 研究東南亞國際關係就必須提到東南亞國協, 但論及東南亞各國的對外政策及區內各國間或多邊關係的專門研究, 則是沒有。研究東南亞與區內各強權如美國, 日本, 中國及印度間關係的就更不用說了。我認為韓國在韓國-東南亞國協關係上的深度研究仍不足。

韓國在東南亞國際關係研究上不足的理由很清楚。第一, 業界對社會及全國性研究的需求極為有限。換言之, 由於韓國各大學或研究機構並不急迫需要相關專家, 在韓國學術界就很難找到此類專家。

又, 自越戰結束後, 東南亞的國際關係事件已難在韓國引發直接或重大衝擊。這也是韓國學者普遍對此領域缺乏興趣的原因。對多數熟悉以強權為中心觀點的韓國國際政治學者來說, 涉及多個中小型勢力國家的東南亞國際政治從未引起太大的興趣。再加上韓國能取得的該區資訊不多, 相關學者就更難深入觀察及分析東南亞的國際關係。外

交與貿易部轄下的外國事務及國家安全研究所可能是唯一的例外，因為其主要工作就是分析韓國與全球強權以及其他區域內國家之間的關係。事實上，就連我亦無法說服自己持續關注該區域。底線是，無需求即無供應，再加上無興趣，就更沒有人了。

但我們仍須注意近年來出現的許多現象。韓國東南亞國際關係不毛之地上已綻放出一朵小花。此即就建立東亞區域性聯盟所引發的辯論，東亞區域性聯盟係在1997年的東協加三高峰會以及2005年的東亞高峰會(EAS)所促成的。該項辯論已加深韓國政治學者更的好奇心。就東亞區域性聯盟的辯論讓東南亞國際關係再次引起注意的理由是東亞區域性整合工作係在東協加三的架構上進行，且係由其主導。再者，韓國在東亞區域性合作的願景策劃上亦扮演重要角色一事實已提高韓國研究人對東南亞地區的興趣。在東南亞國際關係中，東北亞與東南亞間的政經濟關係已引起更多韓國學者的興趣，並進而成為一個流行的研究議題。

就此案例來說，目前研究東亞區域整合議題的需求正快速增加中。共同研究東協加三的計劃有多項，包括東亞智庫網(NEAT)與東亞論壇(EAF)以及其他東亞區域性研究在內的研究機構均持續邀請韓國學者參加，韓國外交部現正間接地協助由對該區域有興趣的學者所組成的東亞社群研究團體積極地進行區域性學術合作。此等新發展自然可以提升韓國研究人員對東南亞國際關係的看法。前景雖佳，東南亞國際關係研究工作仍有長路要走。儘管許多學者已經由有關東亞區域性聯盟的辯論逐漸瞭解到此領域的重要性，但此領域中的專業研究人員卻未增加太多。研究成果仍極有限。單靠學術方面的好奇心與興趣實不足以產生重大研究成果，專業研究人員須靠長時間訓練。

但我們在此仍可在結束此次討論時保持希望，因有多種跡象顯示最近以來就東亞社群所進行的辯論可鼓勵多進行東南亞國際關係研究並在韓國培植出新一代的相關研究人員。我們將會看到韓國國內及海外各大學大量的新一代東南亞專家以東南亞國際關係及東亞區域性整合為題的碩士與博士學位論文。又，如果最近才開始對此領域產生興趣的學者能持續提醒學生注意東南亞研究的重要性，那麼不久就會有新一代的該區域專家出現。韓國及東南亞國協間不斷加強雙方在政治，外交，經濟，社會與文化方面的聯繫，韓國各大學，研究所以及政府均會需要更多的區域性專家，極盼有更多的年輕學子能在他日成為東南亞研究學者。

5. 經濟學

PARK Bun-Soon (三星經濟研究所): 二天後韓國要進行總統大選，我認為此次大選的關鍵字是重振國內萎靡的經濟。馬克思表示，經濟操控一切，但在今天的議程中經濟學卻被排在最後。我對自己被排在最後做報告的事有些不高興，因為原來我是想最先做報告。只是我很難抱怨，因為本正在準備今天的報告，我認為議程的順序多少精確地反應了現實狀況。

由於我經要求就韓國經濟學者所做研究做出書面評論，我因此開始閱讀韓國國內主流經濟學及商業研究作品。我的目的在瞭解東南亞經濟在主流經濟學及商業研究中的地位而不是評論國內區域性專家的作品。所以我專注於1990年以後的韓國經濟性的官方新聞及公報以及管理研究機構的公報。結果很慘。韓國經濟協會所發行的學術期刊是韓國經濟評論。該期刊根本沒有有關東南亞經濟的文章。反而是2005年，**AHN Byung-soo** 發表一篇有關評論國家內政法規的文章，該文章係源起於日本及新加坡兩國在韓國經濟協會所主辦的一次聯合大會中所達成的自由貿易協議。而那份報告亦難

被稱為東南亞經濟研究。我在查閱韓國國際經濟協會所出版的國際經濟期刊，發現其中也沒有有關東南亞經濟的文章。該刊物僅蒐集了一些1998年大會的報告，其中有一篇由韓國大學的PARK Innwon所提出，標題是‘AFTA是否足以讓東南亞國協未來見到進一步經濟成長?’的文章。

韓國貿易與工業研究所發行的是國際貿易與工業研究期刊。1999年版中，首爾大學現任教授WON Yongkul發表一篇標題為“韓國及東南亞國協間貿易與FDI關係研究”的文章。當時，Won在韓國國際經濟政策研究所(KIEP)擔任研究員，而該篇文章之所有被登出是因為其內容包含有韓國及東南亞國協間關係的多項政策，只是內容意義不大。另於2003年刊出一篇由SIN Man-su與他人合作完成，標題為“國際間就1997年-2002年間印尼籍，中國籍及韓國籍受僱人員所做組織性承諾行為比較”的文章。The 期刊 of 韓國貿易 of the 韓國貿易研究協會的期刊韓國貿易則刊出由韓國大學LEE Jang-rho與KIM Yong-sig二人在1997年合作完成的“韓國企業在越南投資個案研究”。

我現已向各位簡單報告有關東南亞經濟學方面的研究狀況，接著我要說明管理方面的研究。根據我自己的研究，韓國企業管理學術社(KASBA)所出版的期刊有二本。一本是管理教育評論，其中有幾篇有關東南亞韓國企業策略的報告。2001年韓國管理評論中則較少見地刊登出一篇專門討論東南亞的報告。由JUNG Ku-hyun, YON Kang-heum及SON Yong-min三人合作提出的“純中國籍企業組織的策略及結構：環境變化及新世代”則看似專門針對東南亞的唯一研究報告。

研究東南亞經濟的困難處在於缺乏參考資料，韓國經濟協會似乎對中國極有興趣。在1990年的第四屆國際會議就是專門針對中國經濟所召開的，而且二年以後的第五屆國際會議更是特別針對中國。在企業及管理研究方面，中國由國家主導的做法值得研究，特別是有關韓國企業的直接投資。

雖說主流學派一直以來均未重視東南亞經濟，研究其政策的報告卻不少。例如，由政府資助的研究機構韓國工業經濟及貿易研究所(KIET)，即不再進行區域性研究。其原係於1976年由韓國基金會專為進行中東研究而創設，後於1979年改名為韓國國際經濟研究所。後再改名為韓國經濟及科技研究所(KIET)，直到1991年改成現今的名稱。此後，該機構一直是世界上著名的韓國區域經濟的研究單位。但在首爾國立大學前經濟學教授CHO Soon於1990年代擔任財政部長後，即創建韓國國際經濟政策研究所(KIEP)，而KIET內的所有區域性研究單位則完全轉移到KIEP。KIET乃一條條件極佳的機構，有受過精良訓練的區域性研究人員，基於其任務，這些研究人員仍留在KIET持續進行其他研究工作。此舉對區域性研究工作實係一大打擊。

KIEP則係另一進行區域性研究的機構。在1980年代末及1990年代初盧泰愚總統主政期間，韓國有一專門研究共產國家經濟機構。後被併入KIEP，而KIEP也不斷地就世界各區域提出大量政策報告。一如大家所知，區域性研究通常能決定政策制訂過程。但由政府資助的智庫研究結果則非純學術性，其中包含有實利動機，諸如韓國如何能有效地運用東南亞。由韓國東南亞研究協會(KASEAS)發行的東南亞評論則就東南亞經濟進行大量研究，唯其仍無法提出肯定性分析並就東南亞經濟進行深入討論，因為相關研究人員人數不夠。

那麼又為什麼東南亞經濟相關研究人員人數會不夠？一如大家所知，1990年代末的東南亞金融危機對韓國的經濟影響極大。因此，韓國經濟學者或企業學者對東南亞經濟

所做研究如此少的現象令人意外。其中有幾項背景因素，其一可能要歸因於襲自美國新典型經濟傳統的韓國經濟學派。以往，由PARK Hyeon-chaе及CHU Chong-hwan所倡導的國家派經濟學多引起部份非主流派的共鳴，但從未收到在首爾國立，延世及韓國等各大學任教或畢業的主流經濟學者的迴響。其中多數後來並赴美留學，而美國的經濟學教科書通常均強調供需理論。但前提是此一供需理論乃普世價值。此即為何傳統經濟原則失去說服力以致經濟紛亂地區無法講求經濟學的道理。事實上，東南亞經濟學者亦在以西方經濟架構研究其本國及區內的經濟。因此，只要東南亞經濟無特殊性，因為當地研究人員未進行研究，看來我們即無須研究東南亞經濟。

由於韓國經濟學術傳統中的此項背景，因此根本無人教授東南亞經濟。我不知道各位是否記得這件事，但我清楚地記得首爾國立大學國際研究所在金泳三總統執政期間在此首次開辦一所區域性研究中心專門針對開發中國家進行研究。但由於政府將大學全球化計劃，韓國多數大學均紛紛設立國際研究所。我就曾聽說在首爾國立大學全球化計劃中負責草擬計劃的是一位經濟學教授，而且他同時又提出現今國際研究所的模式。現在經濟學界中有玩笑性的傳言表示那位經濟學教授手下有許多在美國取得經濟學博士學位的學生正失業中，他因此開設國際研究所提供工作機會。本次大會手冊第一一六頁上即列有接受政府資助各國際研究所課程的資料。其中的課程和一般的研究所課程並無太大的不同，而且也沒有甚麼特別的區域性研究計劃。更沒有可以教區域性經濟的人，可是那些教授們可不管如何提供區域性研究課程給學生，他們只是將自己在美國學到的東西直接交給學生而已。大家都知道韓國教授並不用功，但韓國東南亞研究協會會員是例外。由於懶惰，許多教授只是在課堂上將重複地講述自己在美國學到的東西，而其後果就是這個現象。

第二，東南亞經濟本身就非具吸引力的研究主題。大家談到東南亞時，通常包括十個國家。在經濟學裡，必定有一個密切相關的理論可以說明這十個國家的經濟。但實際上卻是困難重重。我們可以將東亞經濟開發模式應用在區內部份較發達的經濟體上，卻很難在較不發達的中南半島國家中找出任何相似處。這一種不相稱現象正是東南亞經濟不易發展的原因。此外，由於經濟研究需要進行論證式資料分析，偏偏東南亞經濟又缺乏系統性資料及統計性資料庫。我的經驗是，自己任職的三星經濟研究所已開始在每年秋季撰寫東南亞經濟綜觀報告。進行此項工作須蒐集，整理並分析資料。由於部份國家並無系統性資料，所以很難對包括國，柬埔寨及緬甸在內的國家提出經濟綜觀報告。這也是我們通常只就六個東南亞國家提出報告的原因。至於印尼，雖然該國有具體資料，但由於網際網路連線及政府資料管理品質等後勤因素，問題仍多。因為大家均將美國，日本，中國及歐盟看作重要實體，各個國家均有二到三人在做專門研究。由於較不重視東南亞，只有一人被選定對全區做研究。負責研究已開發國家者僅須研究單一國家的做法，且手邊的資料完整。歐洲中央銀行就有系統性統計資料庫。如果我須花十二小時研究六個國家，負責研究日本的人只須花半小時即可，因為有二位研究員共同負責。我的意思是研究東南亞要較研究其他區域難得多。這是事實，那有誰自願去研究東南亞？

一如BAE Geung-Chan教授之前所說，無需求的事實對東南亞經濟的研究工作影響極大。我堅決認為，為瞭解亞洲經濟危機，後代必須檢討1990年代末東南亞經濟出了甚麼錯。我在2000年竭盡所能出版了標題為的五百頁報告“東南亞企業的危機與重整”。幾年後，我問出版商賣出多少本時，出版商回說只賣出六百本。我竭盡所能完成的書竟然只賣出六百本。之後我又出版了二本有關東亞的書，避談東南亞，結果賣出近二千本。今年十一月底我又要出一本小書，這次甚至未包括東亞而只談印度與中國。我將此

經驗與各位分享,但此例顯示需求對研究特定地區與否的確十分重要。

第三個問題是實際上沒有任何東南亞研究在進行中。此又涉及我所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東南亞並未被列在大學課程中。就在我準備這份報告時,查了韓國各大學經濟學系的課程表以瞭解是否有任何東南亞經濟的課。包括首爾國立,延世,韓國,西江及成均管在內的各所謂的知名大學均無此類課程。例如,首爾國立大學經濟學系開設有中國經濟,日本經濟,國際貿易,國際財經整合,但是沒有東南亞經濟。延世大學則不然。釜山國立大學最有趣,它開設有中國及日本經濟史課程 – 並非經濟課程。另有二所大學開設有東南亞經濟課程,是由韓國外國研究大學及祥明大學國際經濟系及法律開設的東南亞經濟。我在上述二所大學都發表過演講,我也認識教上述課程的教授們。開設這些課程的主要原因是這些教授們的個人興趣,與課程無關。

最後,我要問的是東南亞經濟是否真的如此不受歡迎。甚至也不受學生歡迎?我認為根據不是如此。事實上,韓國大學的商學系都開設有不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研究課程,且我教授此課程已有五年。由於中國課程係單獨開設,且唯一的條件是課程內容須包括有韓國企業營運的區域,此舉即決定亞洲研究的區域。我選擇教授東南亞經濟,而且學生人數眾多。有時甚至多達一百二十五人,被公認為最受歡迎的課程之一,所以我在此課程中只得限定每班的學生人數。因此我認為東南亞經濟實在是一項很好而且受歡迎的課程。

那麼我們該怎麼做?我認為各知名大學的經濟學,商學,或貿易系應該開設東南亞經濟課程讓學生可以在大學時即嘗試瞭解該區域。就我與民間合作的經驗,主修經濟學的大學生可以多瞭解並有機會在區域性經濟學中出人頭地。因此,如果主修經濟經濟或商學的大學生能及早接觸東南亞經濟,絕對有助於更多人進行深入研究。

6. 討論

CHO Hung-Guk: 我要說明釜山國立大學的確開設有東南亞經濟的課程。Because我就在該校的國際研究所任教, Park博士顯然未注意到。

PARK Bun-Soon: 噢,是嗎?另在此說明,我的博士學位是在韓國外國研究大學完成的。如果HUFs決定為主修東南亞語言及文學的大一生開設東南亞經濟課程,我極願免費前往任教。只是無人提出此等要求。

CHOI Byung Wook: 其他國家又如何?難道韓國的情況特別差?

PARK Bun-Soon: 我在午餐時問及留美的RA Hee Ryang博士,她表示難以開設東南亞經濟課程的原因在於整個區域中沒有連貫性的模式。由於難以發表演說,我認為在美國找到東南亞經濟課程的機會遠小於中國或日本經濟課程。到了東南亞,局面則完全改觀。新加坡國立大學就開設有許多此類課程。日本也開設有許多東南亞經濟課程。有許多日本學者研究東南亞經濟。

PARK Sa-Myung: 我剛聽說有人在美國唸過東南亞經濟。他是誰?我聽了今天的主講者所說的之後就瞭解到他是另一位東南亞研究學者。

RA Hee Ryang (POSCO研究所): 您好嗎?我是RA Hee Ryang。我是今年六月回到

韓國的,在夏威夷大學唸了五年。我運氣好,現在在POSCO研究所東南亞研究團隊。今天聽了PARK Bun-Soon博士的演講後,我更決定今後要在調查研究及學術研究上多加油。

PARK Sa-Myung: 我們剛迎接了一位真正的高手加入團隊。還有其他人有話要說嗎?

JEON Je Seong: 我曾遇到過一些進行人類學實地研究的澳洲經濟學者,他們就手中透過面談及實地觀察所獲資料在撰寫亞洲地下經濟的文章。世界上並非只有經濟學者在研究經濟計量學。

PARK Eunhong: 我並不完全同意PARK Bun-soon博士的意見。我在參訪京都大學得東南亞研究中心時見到許多著名的日本學者在進行東南亞研究。該中心的主任, **Kosuke Mizuno**, 就是印尼農業經濟的專家。**Akira Suehiro**則是泰國經濟專家。即使東南亞都有許多著名的當地經濟學者,像是馬來西亞的**Jomo Kwame Sundaram**與**Terence Gomez**以及泰國的**Pasuk Phongpaichit**。所以我認為韓國經濟學者仍有理由專研東南亞。

PARK Bun-soon: 或許我的原意並非如此。但事實上,讀過**Akira Suehiro**的海外中國經濟一書後我已開始有興趣研究東南亞。日本研究東南亞經濟的歷史長遠,從日本昭和時期的大東亞共榮圈概念即開始,特別是在大阪,關西地區及京都大學。**Akira Suehiro**對泰國境內的中國資本所進行的播種工作已是經典之作,因為現在已成為泰國社會及經濟學者常用的參考資料。日本長久以來即對亞洲其他區域進行研究。**Tamio Hattori**在日本開發中經濟研究所專門研究韓國經濟的韓國學者進行韓國朝鮮王朝經濟研究時的基本讀物。我所說的是韓國的現況,研究東南亞經濟在韓國並非好選擇。

PARK Sa-Myung: 對。但是我們時間不多了。總結今天各位演說者的意見,大家都瞭解到改善質與量的重要性。問題在於對東南亞研究無需求。一如**BAE Gung-chan**教授與**PARK Bun-soon**博士所說,東南亞課程數量可以透過積極倡議與部份人士的努力增加。由於難以在短期內改變事實,我們現在必須以個別方式採取積極措施。就此,我要再次強調**BAE**教授所使用的說法 – “不毛之地上綻放出一朵小花。”那朵小花又是甚麼?如果是一朵像玫瑰般的燦爛花朵,不久後就會凋謝。一朵玫瑰的生命在凋謝時就結束了。但如果是蒲公英,人越睬它,它越堅忍。我認為韓國的東南亞研究工作就像是蒲公英。它不起眼,但生命力極強。我認為今天的會議足以讓大家瞭解到我們所熱愛及進行的研究生命力有多強。在此結束今天就肯定性議題所進行的討論。多謝各位。